



写在前面的话

本期读书版,我们邀请三位青年作者,解读近期“百本好书送你读”推荐书目中的三本热销佳作。刘楚昕的《泥潭》以冷峻笔触剖开生活表象下的挣扎与韧性;蔡澜的《活过》以豁达通透的人生智慧,指引人们抛开繁杂,活出属于自己的乐趣;李昀鋆的《与哀伤共处》则温柔凝视失落与悲痛,帮助读者直面伤痛,重建内心力量。三本书看似主题各异,实则共同回应着同一个命题:如何在不确定世界中安顿自我。无论你正经历困境,还是深陷哀伤,或许都能从中获得共鸣与前行的方向。

——编者

在泥潭中仰望星空——读刘楚昕小说《泥潭》有感

■姚伟民

“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,但回头想想,都是传奇。”

这是今年5月青年作家刘楚昕在第二届漓江文学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结尾,也是他女友留给他的鼓励。只是,当他站上文学的领奖台时,女友已因癌症离开人世。正如歌词所唱:“越过山丘,却发现无人守候。”

初闻不知曲中意,再闻已是曲中人。

大抵是这种悲伤,促使着刘楚昕一遍遍修改小说《泥潭》,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本痛苦中蕴含希望,怀疑中包含信仰的小说。

《泥潭》分为三部分,分别以三个人物的视角展开,既相对独立,又互相勾连:第一部分的主人公恒丰,是落魄的旗人前军官、左都统恒龄之子;第二部分的主角关仲卿,是革命党人,也曾是恒龄的部下;第三部分的叙述者是圣母堂神父马修德,他作为神父见证了所有人物的命运。

小说一开篇,恒丰就已经死去,故事以他的鬼魂为叙述主体。这种写法不但令人惊叹,更是契合了小说的主题——人们只有在脱离肉身时,灵魂似乎才可以更好地凝视自我。

父亲恒龄自尽后,恒丰踏上了寻找妹妹恒好的旅途。一路上,他遇见形形色色的人:有旗人,有汉人;有同行的,也有推他下泥潭的。他曾短暂投身宗社党,又仓皇逃离;曾在生存边缘苟延残喘,又在失控中犯下了难以被饶恕的罪恶——他也成为了侵犯女人的坏人。

但是,恒丰又不是那种典型的恶棍。他是被时代“卷”入的人,他没有准备,也缺乏信仰。本来是旗人的他,曾在社会上高人一等,但是随着父亲的去世和革命浪潮的愈发汹涌,恒丰的生活急转直下。这时候,他才逐步认清现实,但是他已经无力改变,只能随波逐流。

他那旗人的身子,只有当死去后,鬼魂的叙述才让他得以脱离“旗人子弟”的壳,重新审视那段颠沛的旅程。寻找妹妹的旅程,其实是寻找他还残存的良知。在旅途中,他的身份不断切换:他可以是恒丰,也可以是常丰;可以加入宗社党,也可以临阵退缩——这些变化恰恰说明,他只是时代浪潮里的一叶浮萍,被洪流裹挟到哪里就在哪里,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是谁。

在第一部分中,还有一个叫八十四的旗人,可以说是恒丰的补充。与恒丰相比,八十四充满矛盾,想成为官老爷,又痛恨他们。一边批评旧社会的权力,一边却跪倒在旧社会的权力体系下。八十四比恒丰爱憎分明,但是和恒丰一样找不到自己。

第二部分的关仲卿则是恒丰的另外一个面,他是坚定地愿意“为信仰而死”的人物。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,关仲卿不惜与旧友乌端决裂,更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无数人的死亡。比如留学归来,受到西方思想熏陶的陈天华,最终为了革命而失去了生命;再比如恒丰的父亲恒龄,这位旧时代的领导,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时,因为茫然无措而自杀。

前途是光明的,道路是曲折的。革命的进程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,在这个过程中,关仲卿也逐渐由革命党人的激进变得麻木起来,甚至面对好友的死,他表现出来的只有冷漠。这是令人悲伤的。

第三部分由神父马修德叙述,既是前两部分补充,也是某种冷静的旁观与审判。恒丰一生都在寻找妹妹,却不知自己曾在混乱中毁掉了别人,那个被他伤害的女孩与妹妹的命运以残酷的方式交叠,更像是一种巨大的讽刺。他的忏悔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,反复强调受害者的“丑陋”,暴露了他骨子里未曾消解的优越与冷漠。作为鬼魂,他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看着世间变迁,却从未真正走出自我设下的囚笼。

神父笔下的众人,虽然有名字,却仿佛只是那段历史中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——荒诞、渺小,却又真实存在。他们的命运交织成泥潭,彼此牵扯、沉陷,不断重复着迷失与挣扎。

从《泥潭》中的人物,我们看到了一幅旧时代的悲剧画卷。“三座大山”压得普通人喘不过气,他们在生活里是无助的,是被裹挟着向前的。恒丰的经历,和老舍《我这一辈子》中的巡警何其相似——有时眼睁睁看着别人作恶却无能为力,有时自己也会沦为作恶的一分子。

然而,刘禹锡早在诗中写道: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即便在泥潭中,总会有人先抬起头来,看到更远的方向。尽管关仲卿最终也陷入了麻木,但不能忽视,那时依然有陈天华这样的革命者,为了民族的觉醒而舍生取义,还有更多革命党人,真心想把国家建设得更好。这些泥潭背后的星光,正是拨乱反正、改写国家命运的关键力量。

作者刘楚昕用恒丰、关仲卿和马修德三条线,搭建了一个交错的叙事空间,让人看到个体在时代巨浪中的无力,也看到那微弱却倔强的寻找。就像书中暗含的隐喻:陷入泥潭的人,若能在某一刻停下盲目的挣扎,抬头看看星空,问一句“我是谁”,也许就已经踏出了泥潭的第一步。

但走出泥潭的道路,不应只是个体的自救。一个人脱困,时代依旧泥泞;唯有整个民族都走出泥潭,才算真正改变命运。真正的革命者,他们所追求的,并不是自己过得好,而是让整个国家看见希望。

近些日子,我看了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。那种国家积贫积弱、百姓沦为待宰羔羊的无力感,让我想起《泥潭》中那些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。《南京照相馆》和《泥潭》,虽然故事不同,但都揭示了旧社会下普通人的不幸与困境。

值得庆幸的是,这样的屈辱历史已经翻篇。正是因为有一群怀抱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,团结奋斗、不惜牺牲,才让国家摆脱泥潭,走向光明。他们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星光,更是带领整个民族迎接黎明的人。



■相海龙

人世间最大的哀伤莫过于生死离别,而在青春年少的时候,就失去了父母,这种哀伤更是无法言说的疼痛。

在当今社会,死亡仍然是一个常常被避之不谈的话题,然而,对于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来说,这不仅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命题,更是他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。在他们中间,很大一部分人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未完全形成,人生还没有真正开始,根本离不开父母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指导。在这种特定情境下,他们必然有着自己巨大的“隐藏的哀伤”,这些会是他们长时间的情绪标签。显而易见,他们一方面在快速成长的同时,渴望着自己的独立,另一方面必须主动去适应各方面的深刻变化。

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群体,但并没有受到社会规范性的重视。

90后的李昀鋆在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后,长时间陷入了无尽的哀伤之中。作为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她,及时地关注到了这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和敏感的话题,她历时13个月(2017年8月——2018年9月),采用细腻田野调查方法,采访了44位年轻的失亲者,通过个人的生动叙述,透过独特的观察视角,抓住不一般的情感,记录下他们在丧失亲人后的哀伤与挣扎,审视了他们的成长和蜕变。这些受访的失亲者平均年龄19岁,平均丧亲时间在5.37年。可以看出,作者的深入访谈不仅是对一个个故事的有效捕捉,更是对一种社会特殊现象的积极反思。

全书以“哀伤经验、追寻意义、身份改变”三个核心主题为架构,以访谈为主要内容,揭示了失亲者遭受的心理冲击与自我重建的艰难过程。这些人在变成失亲者后,面临着“被冲击的自我结构、被修订的生命意义、被变动的人生走向”的压力,“而这些突如其来的翻转,也可能使得他们与哀伤共处的时间被拉长到了一辈子。”所以说,与哀伤共处的过程,也是失亲者不断“拆毁”与“建造”、并最终实现成长的过程。在这些翔实的访谈之后,作者发现,“人们害怕的不是死亡,而是死亡所带来的失去。”说到底,哀伤也许不是一件坏事,是孝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,是对父母养育情谊的长久思念;哀伤是爱的一种形式,也是爱的一种代价,是最深层的一种情感表达。

李昀鋆的写作风格实现了学术研究与个人叙述的高度融合,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严谨的研究,又在个人的叙述中真切地体会到细致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共鸣。

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,进行了丰富、隐秘而深层的哀伤叙事,很好地消弭了读者和受访者即失亲者之间的文字距离,减少了彼此理解相通的难度,读者容易在内心激起自己的思考,使得每一个故事都成为有价值的范本。作者在书写时,饱含深情,语言丰富而细腻,尤其在描绘情感碰撞时,极具画面感和感染力,在每一个痛苦的瞬间背后,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和实实在在的爱,能够很好地触动年轻读者,让许多人警觉起来,并主动去反思自己的作为。

作者在人物塑造上颇费心思,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非常鲜活,真实且立体,尤其是众多的年轻失亲者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在故事里面有许多的痛苦和挣扎。通过他们的叙述,不仅很好地呈现了个体的痛苦,也反映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孤独与无助。比如张小姐,面对父亲离世,她深陷痛苦之中,在不断的自我安慰下,最终体验到了关键的“顿悟时刻”。在张小姐回忆父亲的瞬间,她用充满细节的叙述手法,将那个“顿悟时刻”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,让读者在阅读时仿佛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光亮与解脱。而在这一时刻,她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和哀伤,实际上是对父亲痛苦生活状态的同情。张小姐的故事使我们明白,面对丧亲,失亲者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,并不只是一种无助的表现,也有内心里一种爱的反应与渴望。同样,失去父亲的杨小姐在训斥两个弟弟时说,“他(父亲)走了就是走了,你们想这么多,他也活不过来了。”但后来,杨小姐转而认为,父亲留在儿女身上的影响不会因为死亡而中断,虽然死亡带走了父亲的物质生命,但不可能让活在她心中的父亲死去,这是一种彻底的“顿悟”。当然,这样的“顿悟”来之不易,失亲者已经学会用平静的心情去对待哀伤,懂得如何与哀伤共处,有助于他们走出哀伤,逐步接纳自己眼下现实的生活。

全书结构分明,章节安排紧凑,既有故事的发展脉络,也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诸多的情感跌宕变化贯穿在其中。从田野调查开始的背景叙述,到每位年轻失亲者的故事分享,再到作者对这些故事的分析与反思,整个叙述层次清晰,逻辑严谨,也为读者加深理解和思考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安排。

李昀鋆说,“哀伤就像一个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人,它突然闯入了我的生命,从此就不走了,只是没人知道它的存在。”这是一种特别真切的体悟。可以看出,《与哀伤共处》不仅是一本关于哀伤的书,更是一部关于爱的探索和解的佳作,作品中真实的叙述,深刻的分析,令人动容,失亲者如何在绝望中找到人生的意义,进而能够与哀伤共处,慢慢地走出自己内心的“沼泽”,都有十分明确的指向。这本书也让人们不得不思考: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去理解身边人的哀伤,又是否愿意同他们一起走过一段艰难的“旅程”?恐怕很多人没有明晰的答案。这个一直被主流声音长期忽视的庞大群体,应该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更多的理解、同情、安抚、宽慰和支持,这是整个社会应有的责任。

这本书告诉人们,哀伤是对父母的无限深爱。失亲者能够在哀伤的泪水里,开出力量的花朵,让自己始终砥砺前行,或许这样的哀伤才更有价值和意义。

读《活过》忆蔡澜笑迎浮世千重变

■赵欣

今年6月,作家、美食家、电影人蔡澜先生辞世的消息来得有些突然——4月,坊间传言他已病危时,他还淡定地冒泡辟谣:“未至于病危,请不必担心。”读者们才刚松了口气。谁曾想,这担心竟很快成真。

随后便是万千网友悼念。有人以类似宏大叙事的表述,说蔡澜的离去标志着“香港四大才子”时代彻底结束……但对于更多人来说,他们对蔡澜的不舍,或许在于这世间有才有趣的老人又少了一个。

现实中,“香港四大才子”是把酒当歌的老友:写武侠的金庸、写流行歌曲的黄霁、写科幻的倪匡,以及写美食的蔡澜。但对所谓“香港四大才子”一说,蔡澜并不认可,他说过多次:“金庸先生不应该跟我们三个调皮捣蛋的人放在一起,他是一代宗师,我很尊重他。”

七八年前,我曾在几次采访中幸会蔡澜,或是线下真人面对面,或是微信语音交谈,老先生的豁达、幽默、洒脱让我如沐春风,毛孔通透。记忆中那些难忘的印象,在近日翻看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,也是他的首部自传体散文《活过》之后,愈发鲜活生动。

“吃喝玩乐都尝遍了最好的,是无憾了。”他这样写道。“真正的潇洒”,便在这样的字里行间得以具象化。他也一定打心里认同金庸的评价——“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”,这句话被加粗放大,郑重地印在了《活过》的封底第一行。

跟蔡澜所有的文字一样,《活过》带着诚意,酣畅淋漓。潮州出生、新加坡成长、日本留学、香港定居,走过的路、爱过的人、看过的风景、吃过的事物,事无巨细,择其要者,人生的遭际,就在这般娓娓道出。

阅读的过程就像是听老先生摆龙门阵,开放而坦诚。书页摊开,一个笑意盈盈的蔡澜坐到了你的对面。

那是蔡澜式的招牌笑容,五分慈祥,三分机敏,两分狡黠。他笑起来总眉眼弯弯,本就肤白胜雪,映衬着一头银发,愈发慈祥亲切。

“跟我来,朋友。”他就那么笑着向我们招了招手,转身,推开记忆的闸门,带领读者步入自己的83年人生。

这一生漫长且传奇。《活过》的开篇,他从童年开始回忆。这段记忆,尤为值得一提。

《活过》应该会让一些读者看到不一样的蔡澜。因为他将回忆的起点,放在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——抗日战争时期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节点,从83岁的蔡澜笔下读到他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记忆,感受多少会有些复杂。毕竟他给人的印象是游戏人间、嬉笑怒骂。这样一位以犀利文风甚至“毒舌”著称的老顽童,在人生的开局竟也遭遇了人类社会最残酷的战争,直面命运的无常与沉重。

个体命运由此汇入时代洪流,成就了另一种微观视角的战争口述记忆。令人唏嘘。

“战争”是蔡澜童年的一道阴影。他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,三岁之前的记忆,由家中口得悉:“日本鬼子入侵,我们一家,父母、姐姐、哥哥、我及妈妈六人逃难,从市中心一直跑到乡下躲避,情势之下险恶有如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所描绘,炸弹的碎片把人头削去,肚肠横流的画面举目皆是。”

在家乡潮州,年幼的他被妈妈背着,大人

孩子顾不上吃饭,空着肚子逃难,头上有日本鬼子飞机不断飞过。“飞机飞得很低,机关枪扫射,嗒嗒嗒嗒……一排子弹扫了下来,逃在后面的人被子弹穿胸而过,血液飞溅……又是一排子弹扫射下来,柏油路被打出一个个的洞洞,碎石飞扬……嗒嗒嗒嗒,炮火声淹没了婴儿的啼哭。”

因父亲随邵氏兄弟赴南洋发展电影事业,1944年,蔡澜被母亲带到了新加坡,全家团圆。谁料,三岁生日当天,蔡澜正要按潮州传统吃甜面和红鸡蛋,忽然警报大作,竟是英国飞机来反攻日占区,他舍不得当时很难吃到的鸡蛋,在跑警报前赶紧吞下特意留到最后才吃的蛋黄,结果喉咙被卡住,差点憋死。从此一生,看到蛋黄就怕,再也不碰。

另一次更惊险。晚饭吃到一半,飞机又来轰炸,“还没来得及逃跑,一枚炸弹轰隆隆一声出现在我们头顶,给天花板夹住,我还清清楚楚看到弹头。好在弹头里的撞针失灵,不然爆炸开来,一家大小都没命。”

我想,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蔡澜的战争记忆是有必要的——只有知晓他经历过怎样的童年,才能理解他此后80余年,为何将“好玩过瘾”作为毕生追求。“开心也活,不开心也活,当然要选择开心。”在战火下“活过”,蔡澜感慨,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,“所以我一生做人不太努力,也没有经过什么风浪,活到今天。”

当然,永远不要低估任何一位长寿的老人。蔡澜说自己“不太努力”自然是谦虚。举一例,中学时代他会因为爱看西片而努力学英语,“早上上中文学校,下午上英语学校。”

也是兴趣使然,他在电影界“打拼”:16岁留学日本时出任邵氏公司驻日代表,负责国外购片和宣发工作;22岁回到香港发展电影事业,直到1997年彻底告别电影行业,转向美食和旅游领域。人生的最后30年,他写专栏、开公司、做节目,忙得风生水起,不亦乐乎。

打着“不努力”的幌子,1980年至今,蔡澜出版了200多本著作。就算年过八旬也还在“奋斗”,不断发表文章。来到83岁的关口,又动了写自传的念头。于是有了这本《活过》。

“本来不想写,现在又觉得无所谓。”他很诚恳地说,“一个作家一旦停止写作,即使人在生,也与死无异。”

其实,2024年,他曾因老伴离世和跌伤暂停写作,身体好转后再度提笔。“倪匡兄说,我的文章凭一个真字,就能够吃很多年——托他洪福,至今还有不少读者买账,那就写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吧。”

虽然开篇便是战火,但大部分回忆都是快乐的。他也大方承认,人生的遗憾“当然很多……但是如果我告诉别人,别人能不能帮到我?帮不到的,所以就算有遗憾,都不说了。”

书名《活过》源自蔡澜印象最深的一次夜航。当时,他身旁的老外被突然而来的强烈气流吓得半死,见他只是优哉游哉地喝着香槟,很不服气。老外问,你死过吗?他笑着摇摇头说,没有,但我活过。

笑过,爱过,活过。风浪再大,能奈我何?

最近重映的电影《青蛇》主题曲《流光飞舞》,词作者正是蔡澜好友黄霁。歌词里唱,“留人间多少爱,迎浮世千重变。跟有情人做快乐事,别问是劫是缘。”就此送给蔡澜,不能再合适了。

近悦远来
书香重庆



电子书
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

据《重庆日报》